

## 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研究初介導言

陳相因\*

### 一、國際政治的權力變化與知識場域的名稱更迭

相較於臺灣學界對於英美，或者是過去在冷戰時期那些被統稱為「西歐」國家的熱中與熟稔程度，俄羅斯蘇聯（以下簡稱俄蘇<sup>1</sup>）與當時所謂「東歐」國家這一區塊的學術思想和成果確實是較少被提及和重視的。這一現象的產生背後自然有多重原因，究其主要根源則不脫冷戰時期政治因素和意識型態的干擾。然而隨著蘇聯帝國解體，國際局勢重新洗牌，儘管各國的學術界表面上對於汲取知識的企圖不變，但研究的目光焦點、目標方向或名稱範圍卻因國際政治情勢改變而起了不少的變化。舉例而言，美蘇冷戰期間臺灣學界將「冷門的」俄國語言與文學研究納入了東方語文學系底下成一小組，同時間在英美學界的斯拉夫研究卻屬於「熱門與重點」學科。冷戰結束後不久，「蘇東波」<sup>2</sup>讓俄羅斯相關研究在臺灣一度由黑翻紅，曾幾何時俄國語言與文學不再屬於「東方」，躍升為一系，成為一種「西方」。這些「冷熱」現象當然不僅只肇因於國際政治的因素，當中亦不乏國內政治

---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

<sup>1</sup> 目前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研究和一般輿論傾向將 1917 年以前沙皇制度下的俄羅斯帝國、1917 年至 1922 年紅白軍相抗引發所謂「國內戰爭」(Civil War) 時期的俄羅斯、1922 年至 1991 年間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與 1992 年後迄今的俄羅斯聯邦統稱為「俄蘇」，以區別過去指涉蘇聯時期的「蘇俄」一詞。本文沿用此專有名詞主要用以說明，從十九世紀到目前為止，以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為中心的政權在研究中國方面的學科名稱和知識場域的演變。

<sup>2</sup> 1990 年代初期，不少研究前蘇聯與東歐地區的臺灣學者與記者，將從柏林圍牆倒塌開始，前蘇聯在東歐地區和波羅的海附近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求去的一股趨勢浪潮，戲稱為「蘇東波」。這一用語普見於當時的媒體報導與學術論文，也有書籍以此作為名稱。參見王景宏、高惠宇、王麗美：《蘇東波——蘇聯東歐世紀之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

環境改變的諸多因素。最有趣的是，就在近十年間，過去的東歐國家進入歐盟，紛紛改稱自己為「中歐」。而英美的「斯拉夫研究」早已由熱入冷，逐步轉向俄羅斯研究，還在尷尬地討論是否應當正名之際，一些臺灣的俄語系卻又改名為「斯拉夫研究」。就在上述這些史實發生的同時，過去在英、美與蘇聯「東方學」或「漢學」的冷灶（相對於過去斯拉夫研究而言）被燒熱了起來，薩依德 (E. W. Said) 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雖然在一九七八年出版，內容指涉的「東方」多屬中東而非中國，但批判英、美、法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星火一起，加上二十一世紀東方再起的風一吹，也逼得向來自詡為英國漢學翹楚，並自傲其傳統的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所改了名，現稱為「亞洲與中東研究」(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本文主要的目的之一，乃藉由上述這些變化的描繪反映國際情勢的大致走向，令讀者對所謂「東方」與「西方」固定不變的定義劃分與對立本質開始產生懷疑，並顯示政治影響知識領域的問題，以及意識型態前導或主導研究視野的現象確實普遍存在。這一看法的啟發自是源於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其內容提供了一個探索人文學科裏權威、知識與權力的深度視角，先引領讀者進入「東方主義」的世界，從其興起、形成（包括權威或主流如何被知識與權力的核心所製造出來）、執行（其中一種方式為再現的力量）到論述體系與傳承機制的完備，然後作者再由對《東方主義》論述的介紹中層層解析並解構、質疑且批判這一世界所製造出來的「真理」(truth)。選擇這種研究方法的原因，正如作者自己在書中緒論所云，是充滿策略性的 (strategic)<sup>3</sup>。薩依德所運用的這種策略位置 (strategic location) 與策略形態 (strategic formation) 的方法論，突顯了筆者認為相當重要的兩個論點，也是組織本專輯的一個主要動機。第一，在建構論述體系與傳承機制的過程中，主流權威的存在必不可免。但是，在主流權威形成之前、之時與之後多位學者，甚至是多學派之間角力論爭推演的華麗（也可能是混亂）過程，往往是更引人入勝且更值得注意的。第二，在接受或者反對主流、權威、論述或體系之前，必須先對它（們）具有一定程度上多面向的認識與瞭解。否則，對於「東方主義」，或者是本文和本專輯具體指涉的「海外漢學」與「俄蘇東方學暨捷克漢學」等論述，以及其智識系譜學 (intellectual genealogy) 的質疑批判，可能僅高架於對峙的意識型態裏，變成「你有

<sup>3</sup> E.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 20.

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而非落實在對話的交流平臺上，能夠產生「交會時互放的光亮」。當然，在挪用《東方主義》的策略理論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理解，這只是在眾多對話的窗口中選擇並嘗試開啟一扇窗的一種方法，因其框架可以望見一個面向，卻不可能因此得以涵蓋全部的視野。對本文和本專輯來說有意義的是，在這一視角下是否能清楚地呈現問題的輪廓，並且是否能牽引出更多潛在問題。

## 二、認識問題

《東方主義》所述知識學科名稱的問題與意識型態前導的現象，同樣也發生在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的領域裏。基本上，以「東方學」與「漢學」分別作為俄蘇及捷克研究「中國」（泛指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疆域範圍）的專有名詞，如果從嚴格不變的定義來看是有問題的，也可能產生不少歧異的見解。這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從十九世紀以來國際政治情勢變化之快速，遠遠超過工業化時代前的世紀，外在變動的因素，影響了學術領域裏對於內部本質演變的思考與探討。我們可以發現，往往名稱早已經更迭數次、大相逕庭，在本質的發展上卻僅具細微的變化，有時候外顯條件讓人誤以為知識層面進入了一個革命後的全新階段，其實內部結構不過是一次換湯不換藥、細微差別的演變而已。但是，正因為「東方學」和「漢學」這兩個專有名詞的主體在二十世紀末期已然成形，故易使人產生聯想與期待，亦可能遭人非難且批評。或有人問：「『東方學』與『漢學』的差異何在？」「從十九世紀俄羅斯、二十世紀蘇聯到當代俄羅斯，這兩個專有名詞代表什麼意義？說明什麼樣的知識背景？有哪些研究科系？範疇為何？是否與時俱變？」「俄蘇和捷克學術界是否能歸納為同一知識場域？會產生什麼問題？是否有別於英、美、法的『東方主義』（或更確切地說是薩依德筆下的東方主義）？」「前蘇聯領導的集團，包括東歐等國，又是如何理解、認同並承繼這兩個專有名詞與其所代表的知識領域？這兩個專有名詞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

上述等等重大問題，是促使筆者組織這一專輯的原因之一。然而此一初介專輯發行的意圖並非在於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先經由資訊介紹進而認清問題的本質，引發更多潛在問題的探索。籌備本專輯之前，筆者先行參考了國內對於所謂的俄蘇與東歐「漢學界」曾經做過的研究資訊，特以本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與《漢學研究通訊》的過往文獻為例，回顧過去臺灣對俄蘇與捷克所做的研究介紹。筆者發

現，一般的中文學界對於「東方學」與「漢學」兩個專有名詞常混為一談。更須注意的是，臺灣對前蘇聯集團分裂出來的這一區塊的研究機構，不論究其歷史沿革、組織架構、理論派別，或者是研究範疇與學術出版品等方面的瞭解皆不夠深入。此外，這些研究資訊零碎且多分散在兩刊，特別在九〇年代的不同期別與訪談內容中，或一頁或三頁，忽一機構忽一學者的簡介。筆者先針對上述兩種期刊綜合歸納所有資訊來源，發現這些對俄蘇與捷克的知識主要經由下列三個管道得來，下文分別以俄蘇與捷克兩部分試析之。

在俄蘇部分，第一種管道是透過來臺的俄蘇學者執筆介紹，以中文寫成。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的李福清院士 (академик Б. Л. Рифтин) 就是這一管道裏一個十分顯著的例子。從兩期刊來統計與俄蘇研究資訊相關的論文，不論是就個人專訪、書評，或是發文介紹的數量上來看，李院士都屬箇中翹楚，與臺灣學界淵源甚深<sup>4</sup>。根據這些統計資料上來看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自九〇年代以來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就只有一位學者研究中國，而在這一傳播的管道裏李福清院士個人就提供了泰半的資訊。但是，俄羅斯科學院裏主要研究中國且成員數量最多的是遠東研究所，卻僅有貝列羅莫夫一人曾經提供過一篇該所簡介，且竟還透過英文翻譯<sup>5</sup>。最令人遺憾的是，俄羅斯科學院裏研究中國最老字號的東方研究所，大約有十位研究人員鑽研中國文、史、哲與比較研究四個領域，卻沒有一位學者曾經在這兩種研究通訊刊物裏出現過任何一篇文章。

<sup>4</sup>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從第一卷第一期開始迄今，總共出版六篇與俄蘇學界動態或研究資訊相關的論文。李福清院士作為作者、受訪者或介紹對象的論文就有三篇，分別為李福清：〈中國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大通——俄羅斯索羅金 (V. F. Sorokin) 教授七十生日〉第 7 卷第 4 期 (1997 年 12 月)，頁 129-134；簡光明：〈專訪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先生〉第 1 卷第 2 期 (1991 年 6 月)，頁 87-94；〈蘇聯漢學家李福清教授來臺講學〉第 1 卷第 1 期 (1991 年 3 月)，頁 109。《漢學研究通訊》介紹關於俄蘇學界資訊的篇章較多，本文截稿前共計二十五篇，當中就有十二篇是由李院士撰寫，且幾乎都在 1990 年代出版，詳細篇目內容可參見《漢學研究通訊第 1-20 卷總目錄》，頁 199。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僅有兩篇，一為〈紀念俄羅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誕生一百二十週年〉第 20 卷第 3 期 (2001 年 8 月)，頁 63-69，以及〈《聊齋志異》在俄國——阿列克謝耶夫與《聊齋志異》的翻譯和研究〉第 20 卷第 4 期 (2001 年 11 月)，頁 28-42。

<sup>5</sup> 貝列羅莫夫著，張琰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簡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4 期 (1994 年 12 月)，頁 92-95。

上述這些現象說明什麼？臺俄漢學界交流的平臺是非常單一、單向而被動的。同時必須注意，上段敘述絕非意指這些俄蘇學者的文章內容出了什麼問題，而是意圖讓讀者警覺並深思下列幾個重要問題。其一，傾向於單一和單向的資訊來源可能會產生什麼問題和現象？是否影響知識的主體 (subjects) 建構和架構？如何讓知識主體在建構的過程中存在多元的資訊？其次，為什麼俄羅斯科學院的人文學科中，至少有三所以上的學者針對中國文哲進行研究？東方研究所、遠東研究所與世界文學所的主要差異為何？這些研究員知識背景的異同之處又能說明什麼？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解答，除了密切地連結知識領域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角力、歷史與結果等相互關係，也與「東方學」與「漢學」知識的主體建構和架構息息相關，亦可說明這當中理論派別間頡頏傾軋和相互滲透影響的過程。職是之故，本專輯特邀當代俄羅斯研究中國的幾位主流權威，同時也是（或曾是）知識主體架構的繼承者與建構者——分別為遠東研究所所長齊塔連柯院士 (акад.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東方善本研究所（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部）所長波波娃教授 (Профессор И. Ф. Попова)，以及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系前系主任謝雷布里可夫教授 (Проф. 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 與楊頌教授 (Проф. Р. А. Янсон) 四人——為本期通訊執筆，從介紹系所的歷史沿革到出版品概況，作為這一系列的出發點，希冀讓讀者對俄蘇學界研究的知識背景與生成過程有更多面的瞭解和進一步的認識。

臺灣中文學界得知俄蘇研究資訊的第二種管道則是來自中國大陸。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與《漢學研究通訊》兩種期刊裏，主要有兩位中國大陸學者專門撰寫與俄國東方學和漢學相關的研究資訊。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就在俄蘇學者逐步退出這兩個期刊的溝通平臺之際，大陸學者陸續接手，建構臺灣對俄蘇知識的新主體，或者是填補過去的舊架構。這兩位大陸學者，一為南開大學西方語文學系教授閻國棟<sup>6</sup>，除了為上述兩種刊物撰稿外，近年來在介紹與挖掘俄國「漢學」這一領域的史實和史料上也不遺餘力，相關著作與譯作豐富<sup>7</sup>。另一位則是目前任職中國社會科學

<sup>6</sup> 在《漢學研究通訊》裏，閻國棟撰寫過下列文章：〈喀山大學與十九世紀俄國漢學〉第 20 卷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51-57；〈比丘林與俄國漢學〉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8 月），頁 70-80。但《中國文哲研究通訊》沒有出現過閻的任何文章。

<sup>7</sup> 專書著作方面，可參見閻國棟：《俄國漢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與《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年）。另有專書譯作，阿列克謝耶夫著，閻國棟譯：《1907 年中國紀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陳開科<sup>8</sup>。

或有人問，既然已有第二管道的形成並中繼第一管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仍舊可以獲得知識，難道會產生什麼嚴重的問題嗎？此中重點就在於我們僅被動地獲得知識的片面結果，而未能進入那些形成結果前各家的精彩推論、衝突爭論，或者是相互融合的不同華麗通道（過程）。另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時刻警惕的，也正是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貫徹全書的一個主題意識：知識如何越界伸展到國外與他方用以認識客體，並且在自己國家建構起殖民意識的知識主體。那麼一旦擁有這樣的知識，就等於是擁有權力宰制客體的知識，讓主客體都一致相信主體對客體施展權威的正當性<sup>9</sup>。若從這樣的視角出發來探討，臺海兩岸間重大分歧的意識型態，是否也影響了對知識的汲取、認知與認定，進而連貫主客體的建構系統和權力運用？同時，就像薩依德強烈地批判歐美對東方的研究，歐美所謂的東方學專家必須承認自己生活環境的真實狀態：也就是他必先為一個面對東方的歐洲人或美國人，其次才是一個個人。不管一位歐美學者對這樣事實的覺知有多麼模糊微弱，他都屬於由東方獲取一定利益並握有權力的一方，還更是幾乎自荷馬時代以降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積極主動介入建構東方歷史的一員<sup>10</sup>。不可否認地，同樣在面對前蘇聯集團與俄羅斯時，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臺灣人因所處大環境不同，在訊息處理、知識製造和意識型態上自然多有迥異之處。但若果真如薩依德所關注擔憂的，被動的一方是否也將被視為完全沒有再現自我的能力？那麼，我們終將拱手讓出話語的權力成為客體，並全盤內化中國大陸製造的知識？對於這些問題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畢竟交流的知識互動與資訊互換的過程牽涉著錯綜複雜的權力競逐。

經由歐美學者、海外華裔或歸國學人而得的研究訊息，是作為傳輸俄蘇與捷克方面資訊的第三種管道。在過去冷戰期間，這一管道通常也是這三種類型中最潛在且最間接（第二手外語）的，但對於國內學術大環境的影響力量卻也是最直接和深

<sup>8</sup> 陳開科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發表過一篇文章〈莫斯科的孔夫子——記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家 L. S. 貝列羅莫夫博士〉第 9 卷第 1 期（1999 年 3 月），頁 149-163。出版於《漢學研究通訊》則有〈19 世紀俄國漢學大師巴拉第的生平及學術〉第 25 卷第 3 期（2006 年 8 月），頁 27-36，以及〈俄國第一份漢學集刊《俄國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 27 卷第 2 期（2008 年 5 月），頁 27-35。

<sup>9</sup> E. W. Said, *Orientalism*.

<sup>10</sup> *Ibid.*, p. 11.

遠。例如，過去在臺灣「俄語」被列入「東方語文」系裏，現下科系更名為「斯拉夫」，知識領域的劃分發展和方法，某一部分顯然帶有歐美知識主體權力運作的銘刻痕跡<sup>11</sup>。蘇聯解體後，臺灣原本對前蘇聯集團的外來知識架構，也才有了演變與重建的契機。這一重要轉變也使一些過去專注於俄蘇的文學或歷史兩個領域，並自歐美地區學成歸國的臺灣學者，像是歐茵西與余敏玲，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也間或從事俄國與東歐諸國中研究資訊的介紹<sup>12</sup>。

另外，特別在捷克漢學資訊輸入的這一面向上，第三管道存在著許多有趣且值得注意的現象。舉例而言，普實克 (Jaloslav Průšek) 的名字能為國內與大陸學者所廣知，最初乃源自於他與美國華裔學者夏志清 (C. T. Hsia)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末期的論戰<sup>13</sup>。雙方辯論皆以英文論述，內容有極大篇幅主要是針對魯迅作品的評價。後來，普氏一些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章由其學生李歐梵 (Leo Ou-fan Lee) 編輯而集結成冊，於一九八〇年在美出版，一九八七年在中國大陸出版中文譯本<sup>14</sup>。有趣的是，由身為承繼蘇聯東方學而開創捷克漢學的專家普實克（先以大面向來看，暫且權稱普氏為 Orientalist），對決深受英美文學影響，且言必稱西洋文化的學者 (Occidentalism) 夏志清，兩者針鋒相對的不同論點並未隨著時間消逝；論戰裏一些意識型態因素與「左」、「右」問題，反而在當前兩岸中文學界的差異中突顯了出來。就在二〇〇六年夏志清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幾個月後，中國大陸與捷克共同舉行了三次紀念普實克誕辰一百週年的學術活動。這兩個事件在論戰事隔三十餘年

<sup>11</sup> 亦可以從臺灣這一現象反觀「中文系」在美國的發展，1960年代末期一些知名的美國大學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把中國研究放在 Department of Germanic and Slavic Studies 底下。相關討論參見王潤華：〈國際化／本土化的中文系：不斷改名定位、整合重組、越界轉型〉，《全球在地文化研究》（桃園：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2008年），頁131-144。至於1960年代英美學界為何將這些領域化整為一個科系，並對當時科系發展所做的現狀與未來評估，薩依德在《東方主義》書中將源頭指向一份英國政府底下設置的委員會所做的「海特報告」(The Hayter Report)。參見 E. W. Said, *Orientalism*, p. 53。

<sup>12</sup> 歐茵西：〈俄國與東歐諸國的中國文學翻譯〉，《漢學研究通訊》第13卷第4期（1994年12月），頁241-244；余敏玲：〈國共兩黨與共產國際關係之俄國資料介紹，1920-1940年代〉，《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3期（2001年8月），頁8-15。

<sup>13</sup> 這場論戰的一些詳細資訊可以參見本專輯裏的拙作：〈普實克與「他的姊妹」——中國〉。

<sup>14</sup> Jal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後又被命運連結在一起，開端或有偶然成分，但在兩岸後來的發展卻又無法不連帶政治性與話語權爭奪的意涵。根據陳平原的說法，普實克紀念會裏部分中國學者提及，普氏在一九六〇年代時把夏志清批得「啞口無言」<sup>15</sup>。這一敘述恰好證明了該學者並未完整地看完雙方陳辯（非常可能僅閱讀過普氏一方說辭<sup>16</sup>，加上一些意識型態先行前導的臆測和想像；抑或可能都沒讀過雙方），因為事實上夏在面對普氏的質疑時從未住口過，在不少文章和不同場合裏的多次反駁言之鑿鑿。近期王德威持平地審視普實克，意圖建構起一條中國「抒情傳統」在現代語境發展的主軸，內文雖指出普實克的研究角度有些盲點，卻也顯示他在抒情主題的發掘上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sup>17</sup>。本文重點不在評論孰對孰錯，而是在說明雙方一系列的論戰仍舊在各地延燒至今，足見第三管道的影響力。不管是過去當事人的肉搏戰、旁觀者的敲邊鼓，抑或後人觀棋的頓悟指點，都可以由大到細、由深至淺從各個角度來探討。第三管道亦即所謂「海外漢學」，不論是以東方學角度或以西方學視野出發，都是一個充分反映知識和權力交會的畛域，也是任何愛憎主觀意識都無法忽略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一九九三年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解體後，臺灣與捷克共和國之間的學術交流平臺已經完全不等同於上述臺灣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的學術交流。臺、捷雙方因具某些類似的政治與國情發展（像是由戒嚴進入解嚴的社會變遷與政權和平轉移等等外在條件，以及面對強權大國的社會心理的相似），合作關係反而更顯緊密。瞭解捷克漢學發展的管道，除了上述透過境外他者的介紹之外，也有直接來自捷克漢學家所提供的資訊。《漢學研究通訊》即曾邀請兩位當代的捷克漢學家口述或發文，介紹捷克漢學界機構、組織架構、研究計畫、出版品概況與學術貢獻等。一為較早

<sup>15</sup> 陳平原：〈視野・心態・精神——如何與漢學家對話〉，《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7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90。

<sup>16</sup> 中國大陸翻譯者李燕喬等人將李歐梵所編輯的英文原書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見註 14）翻譯為《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但可惜的是譯者並未尊重原編者持平的作法，將夏志清回覆普實克的文章“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Reply to Professor János Průšek”收為附錄，以利讀者閱讀雙方陳辯再自行判斷。由此選譯作法可以推測，該位學者可能從未閱讀過夏志清回答普實克的這篇文章。

<sup>17</sup>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3 期（2008 年 9 月），頁 77-137。



來臺的包捷 (Lucie Borotová)<sup>18</sup>，一位則是現任捷克查理士大學 (Charles University) 東亞研究所副教授及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主任羅然 (Olga Lomová)<sup>19</sup>。這兩篇文章透露出，捷克漢學家專注在聽、說與讀漢語的能力，較少在書寫中文表達自我上用力，這點與傳播俄蘇學術資訊的第一管道裏有些許細微的差別。也因此，處在臺、捷研究資訊溝通平臺上的學者可能必須具備第二外語能力<sup>20</sup>，來詳加考察這管道存在的聲音和意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臺灣蔣經國國際交流基金會將國際漢學在歐洲的中（重）心設在查理士大學，自一九九七年以來，臺、捷每年都有交換學者與學生的合作計畫，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情況密集而良好<sup>21</sup>。普實克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國，我的姊妹》(Sestra moje Čína) 一書最早從捷克文翻譯成英文的版本，就是由蔣經國基金會所贊助的。這一結果與其決策的過程當然不僅只有學術與專業的考量，也顯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和權力因素。較為可惜的是，目前這本書在市面上的中文翻譯卻只有簡體而沒有繁體字的版本<sup>22</sup>，這部分也間接地說明了上述臺、捷溝通平臺的處境。

### 三、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概念的意義

如何定義專有名詞「東方學」和「漢學」，並解釋兩者差異，是這個專輯，抑或是當代學者最感困難棘手的一個問題。正因如此，試圖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成了筆者籌組這一初介專輯的主要動機之一。那麼又為何將俄蘇所有研究中國人文學科的學術資訊與專書著作總稱為「東方學」，卻將捷克的部分統稱為「漢學」呢？最主要原因在於，在細閱與瞭解兩國學術機構（或稱權威）背後知識生成的背景、

<sup>18</sup> 孫秀玲：〈布拉格捎來的春天〉，《漢學研究通訊》第 16 卷第 2 期（1997 年 5 月），頁 152-156。

<sup>19</sup> 羅然撰，崔燕慧譯：〈捷克漢學研究現況——兼述蒙古、西藏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 19 卷第 3 期（2000 年 8 月），頁 392-397。

<sup>20</sup> 通常指的是英文，較少德語和俄語，雖然捷克語與德語和俄語有諸多相似之處。在前蘇聯時期長大的捷克人盡管在當時義務教育體制的規定下必須學習俄語，但是捷克獨立後，絕大多數的捷克人不願意說、甚至是聽到俄語。以英語書寫學術著作可能也是捷克漢學界一項必備的訓練，這和普實克個人經歷，以及一些他的學生流亡到英語系國家有關。

<sup>21</sup> 羅然撰，崔燕慧譯：〈捷克漢學研究現況——兼述蒙古、西藏研究〉，頁 393。

<sup>22</sup> 參見拙作：〈普實克與「他的姊妹」——中國〉。

目的、歷史、架構和導向等等各項因素後，筆者認為，儘管俄蘇與捷克在研究中國人文學科方面有著相近的理論學派（如後者對前者的形式主義和語言學的繼承）、類似的意識型態（都曾為共產主義國家）和密切的學術合作關係，但是兩國學界卻存在著一個根本上的程度差異，那就是根源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權威心態和政治視野。根據薩依德的看法，東方主義存在的論述是產生在一個不公平的各式權力交換的場域裏，包括有政治性（如關連著殖民和帝國建制）、知識性（如一些主流科學，像是比較語言學或解剖學，或其他的當代政策科學等）、文化性（像是何謂品味、文本和價值的正統與典律），還有道德性（就如一些關於「我們」做什麼和「他們」不能做什麼）等等各面向權力交換的畛域<sup>23</sup>。如果接受這種說法，那麼在本專輯內容裏就不難發現，俄蘇從最初到現在研究中國的目的強烈地帶有這種權力交換的傾向。最有趣的是，這些俄蘇專家描述著十九世紀初以來，從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設置開始，到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成立與壯大，研究重鎮東移至莫斯科，漢學研究所的建立、廢止，到由遠東研究所取而代之的這些史實，說明了論述主體一系列的演變和質變，以及與之交換權力或交流對話的客體、地理位置和系所領域盡是物換星移。儘管變化無所不在，但俄蘇學界對中國的研究就如薩依德對東方主義的強烈質疑，「其學科內懷有永不間斷的野心，意圖掌握一個世界的所有」<sup>24</sup>。專輯內文章亦顯示，儘管俄羅斯科學院從十九世紀以來至今經歷過三個政權的改變，從研究內容、範圍和主題上卻可以看出這種東方主義的企圖心：不論是東方研究所還是遠東研究所，關注的不僅在中國內部各民族，還有中國與東亞、中亞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這絕非僅有「漢學」一詞的視野所能概括。

然而，對於俄蘇這種企圖控制一切的權力表現與再現，捷克學界相對地顯得薄弱許多；後者將領域界定在他們所認為的「純粹知識」範圍內，主要研究中國語言、文化和文學<sup>25</sup>，希望能夠排除外顯的政治性權力介入和干擾的狀況。然而，要在真空狀態下製造知識，如薩依德所云，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sup>26</sup>。本文之所以使用「漢學」(Sinology) 一詞來描述捷克學界的情況，除了作為區別俄蘇與捷克兩國在

<sup>23</sup> E. W. Said, *Orientalism*, pp. 12-13.

<sup>24</sup> *Ibid.*, p. 109.

<sup>25</sup> 羅然撰，崔燕慧譯：〈捷克漢學研究現況——兼述蒙古、西藏研究〉，頁 393-396。

<sup>26</sup> E. W. Said, *Orientalism*, pp. 9-11.

程度上顯示的差異性之外，也因為捷克與中國兩國的學者時常使用這一個專有名詞來描述捷克研究中國這一門學科的主體。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一主體的知識建構絕非沒有政治性權力的干預。當捷克漢學家使用「漢」學一詞來「兼述蒙古、西藏研究」時，難道不曾心生警覺？在這波東與西、主體與客體論述角力和逐步易位的浪潮裏，力量較為弱小的「西方中的東方國家」也得（自發、被迫或不自覺地）遵守權力與知識這一畛域裏的遊戲規則，內化強權下被預設的知識領域的定義和範圍。儘管「漢學」發展之初，一般定義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研究中國方面的一門學科，但時至今日意義已產生變質 (transmutations)。「漢學」一詞原是海外為主體，中國為客體的論述建構，進入所謂「全球化」的時代，一些學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中國反客為主建構起「軸心漢學」的概念，去對抗他們筆下的「海外漢學」<sup>27</sup>。暫且不論這些學者的用意為何，本文關心的是，這一主體質變的重點不在修正過往謬誤並拓廣各種可能性，而在利用權力交換機制達到控制一切的企圖心。隨著中國大陸崛起的事實，我們在「兼述」其他民族的「漢學研究」問題上應有更深入的辯證和探討。

#### 四、結 論

由導言裏可知，此一初介專輯的編輯目的並不僅僅限於一般性的學術資訊介紹（顯而易見，那樣的作法實在容易太多），而是藉由初步的歷史回顧和資訊傳輸，提供一種視角來探勘和考掘可能存在和潛在的許多問題，與重新認知這些問題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權威的詮釋、知識的建構和權力的機制固然是當中值得關注的議題；在導言裏運用「東方主義」理論的作法，其目的不在使設定的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和解決，而在於提供一種可能的方法作為開端。換句話說，只有持續地嘗試各種理論並尋找不同的視角，才能呈現問題的複雜性與多面性，方有機會明察秋毫且得見輿薪。必須澄清的是，正如薩依德滔滔雄論之餘，不忘諄諄告誡：提出質疑是懷著對人文學科裏知識、權力與權威等種種問題的縈縈關懷。本文不是反對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所做的一切學術貢獻，更切切不能無限上綱、誇大其詞地漫談

<sup>27</sup> 參見平田昌司：〈從海外漢學看軸心漢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7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99-104。

意識型態的指摘。這些不僅完全與事實相反（正如薩依德自剖自己多少受到東方主義者與其著作的影響<sup>28</sup>，筆者亦曾受過俄國學術教育的薰陶），更使得這些重要的問題焦點被模糊而淡化，全然是無濟於事的。

這一專輯名稱既有了「初介」二字，思其義即可明白這一專輯的完成遠非意味著結束，正好相反，對於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的知識傳輸與批判閱讀才剛開始起步。「萬丈高樓平地起」，本專輯不過是建構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這一社群裏高樓下那地上的第一小塊磚，目的是帶領中文讀者初步明白研究機構的歷史沿革、發展轉變、研究方向與學術成果。還有一點需要注意且為薩依德在《東方主義》裏所批評的，那就是這一社群的學者、學術機構與國家政府之間過於親密的顧問性質關係<sup>29</sup>。這樣的關係是否在文化上形成了如雷蒙·威廉斯所稱的「內在的支配模式」(the inherent dominative mode)<sup>30</sup>，或者可以歸類為如傅柯所云的一種權力機制的運作<sup>31</sup>，影響著或操弄了這些知識高樓的潛在設計與內、外在結構？如果是，那麼處在冷戰過後邁向「全球化」（或有學者稱「假全球化」<sup>32</sup>）時代的我們，又將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固有的、過去的外國知識？難道所謂「過時的」知識就真的一無可取？帶著這篇導言裏所提及種種的問題意識，保持著薩依德對「東方主義」警覺而懷疑的態度，進入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這一社群大樓的華麗通道與知識殿堂，仔細地審視一磚一瓦的構造，就是我們籌備並組織這一專輯的後續工作了；屆時希望在介紹學術資訊之外，亦能針對上述種種問題提供更深入的探討。

我們非常感謝雷布里可夫、楊頌、波波娃等教授和齊塔連柯院士賜稿，成就了這一初介專輯。謝謝他們分別介紹自己所處學術機構的歷史、發展沿革與近年的學術成果；這些第一手資料豐富了臺、俄溝通管道的聲音，有助雙方相互理解並開闊更廣的視野。另外，本專輯並未邀請捷克學者撰文介紹該國學術機構，乃因《漢學研究通訊》的兩篇專文已經做了十分詳細的論述。當然，這專輯仍有許多未竟之處尚待改進；例如：籌備的期間仍未能有機會和管道邀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學

<sup>28</sup> E. W. Said, *Orientalism*, p. 336.

<sup>29</sup> *Ibid.*, p. 326.

<sup>30</sup>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p. 376.

<sup>31</sup> Michel Foucault, *Power/Michel Foucault*, ed. J.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sup>32</sup> 張小虹：《假全球化》（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7年）。

者為此專輯撰文，在拼貼俄羅斯東方學的知識構造上自然也就少了一塊鮮明的圖片。最後，筆者在此要感謝呂正山、徐子芳與陳志豪幾位助理和碩士研究生能忍耐嚴格的俄語翻譯訓練和要求，畢竟在臺灣懂俄文又願意花大量時間和心力來耕耘俄蘇東方學領域的人才著實不多。謝謝他們這一年半來反覆地閱讀這些原稿，願意多次與我討論、琢磨和修改譯文的用字遣詞以求內容詳實且語氣通順，同時也能達到與原文水準相符的要求。職是之故，專輯裏的翻譯文章雖屬第二手，但相信與第一手的資料內容相去不遠。只是，儘管我們再三重複著閱讀、推敲、翻譯、重譯與校對的過程，疏漏在所難免，敬請先進與同行們不吝賜教指正。